

罗柳溪:谍战中的传奇英雄(1)

◆ 王征明

投笔从戎 跟随远征军激战怒江

1918年罗柳溪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医生家庭。父亲罗子昌与德国人合作创办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并开业行医,稍后又开设格致西药房。母亲出身农民家庭,自学文化主持家务,又兼药房制药师。父亲先后娶了两个小妾,从此家超吵闹不休,最后父亲抛弃家庭一走了之。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躯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已很艰难,不幸又遭火灾,多年经营的药房付诸一炬。母亲只得领着子女10人苦苦支撑,1930年在贫病煎熬下离开人世。

幼年孤苦无依的罗柳溪曾到宜昌大姐夫开的绸缎店里当过学徒。大姐夫是个势利商人,罗柳溪小小年纪就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。后来在二哥的帮助下读完小学,二哥竟又不幸病逝。二姐嫁给贵州军阀手下的张蔚彬。1934年,张任湖南军阀驻(南)京办事处主任,二姐任秘书。罗柳溪寒暑假均去南京,二姐一家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家相熟,他因而认识了吕超的儿子吕蔚华和吕一峰(吕超弟弟)的儿子吕美华。后来他们同在海军学校学习,成了莫逆之交。

1937年7月初,罗柳溪投考南京中央大学时,抗日战争爆发,罗柳溪热血沸腾,立即改为报考陆、海、空军军官学校,先后收到三校的录取通知。他虽向往空军,但杭州的空校正在撤退,只有海军电雷学校(鱼雷快艇专业)9月份可到江阴报到,于是他到该校报到了。11月间,海军电雷学校奉命撤退江西。到达汉口时,耳闻南京沦陷的噩耗,日寇入城时进

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,罗为之震惊,发誓以身报国,雪此血海深仇。

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利后,电雷学校撤销,学员并入海军学校,后又入黄埔军校第17期受训。1941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,盟军成立中印缅战区,蒋介石任总司令,史迪威中将任参谋长,组建了远征军,奔赴滇缅前线。罗卓英任远征军司令,肖毅肃任参谋长,罗柳溪在参谋处任参谋,旋调任肖毅肃的侍从参谋。1944年春,远征军强渡怒江反攻作战,战斗酷烈,双方伤亡重大。1945年1月胜利结束远征任务,收复滇印边陲大片失地。罗柳溪在前线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,多次获得长官部表扬,并被授予光华勋章。

远征军结束后,国民党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,何应钦任总司令,卫立煌任副总司令,肖毅肃任参谋长,罗柳溪任少校参谋,仍任肖毅肃的侍从参谋。就在他制定反攻中国南方的作战任务时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!

内心苦闷 “吕老”给他指点光明路

1945年9月1日,罗柳溪随陆总从湖南芷江飞抵南京。飞机在上空盘旋时,他眼见紫金山下雄伟的中山陵宁静依旧,充满胜利归来的喜悦,但8年前告别南京时,全城一片火海的惨状又在脑海中浮现,不禁感慨万千。他隐约感到凯歌声中隐藏着内战的危机,国将永无宁日,前景令人忧虑。

从芷江来南京时,罗柳溪曾与吕蔚华商议,到南京后要设法找到吕美华在南京的父亲吕一峰一家。

在惊险复杂的谍战中,曾经涌现出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人物。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罗柳溪,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

一九四一年,罗柳溪在远征军时留影

回南京不久,吕蔚华看到一册旧杂志上有吕一峰写的一篇文章,于是通过这家杂志社找到了吕一峰家。当吕蔚华带着罗柳溪见到叔叔一家人,讲起八年战火离乱的情景,彼此惊喜交集。此时吕一峰老人刚刚病愈出院,美发长髯,一派学者风度。吕家为两位青年远征军官举办了欢迎宴会。吕老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,留学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,以后与邓演达在一起工作,“九一八”后在京沪做救亡工作。京沪沦陷后,在上海曾被挟持参加汪伪工作,在大学任教和写文章呼吁统一救国。

吕老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,希望重庆谈判能够成功,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罗柳溪则直言相告,幸福的生活老百姓都渴望,可是现实是非打不可了。吕老问为何坚持要打,罗坦率回

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

高建国

17.撒下天罗地网

由于于玲在江阴很快打开工作局面,建立了抗日武装,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也很有起色,因此成为“忠义救国军”的肉中刺、眼中钉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于玲带一副近视眼镜,“暗杀党”寻隙行凶时,误把戴眼镜的祝塘民运工作队队长、上海姑娘林杰当作于玲,在陆桥陈家坝残忍杀害后匆匆逃离。那一年,林杰刚满18岁。林杰牺牲后,当地盛传于玲被杀。但很快“暗杀党”发现,于玲并未死,对她更是恨之入骨,处心积虑要刺杀她。

刺客重返祝塘并盯住于玲时,两人正隔着一条河。凶手迫不及待拔枪射击,由于距离较远,手枪打高,子弹从于玲头上飞过去了。十分熟悉当地地形的于玲飞身躲避。刺客袭击于玲失手,恼怒间对准陆桥职工工会负责人陆掌福开枪,但恰巧子弹卡壳,未能打响。穷凶极恶的刺客接着奔过来,抽刀向陆掌福砍去,陆掌福徒手与他搏斗,负了重伤。

“暗杀党”的罪恶行径和疯狂冒险,激起了东路地区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。“江抗”常备队迅速开赴陆家桥,紧紧依靠当地群众,撒下了搜捕“暗杀党”的天罗地网。于玲把大张旗鼓镇压“暗杀党”与智取巧攻结合起来,从9月起,就布置在祝塘华士家庭林厂工作的共产党人龚吉义,伺机接近“暗杀党”。龚吉义受领任务后,设法取得了“暗杀党”头目包福銜的信任,及时把获取的情报送到“江抗”东路指挥部。当获悉“暗杀党”大队长毛耀南携情妇从华士乘船去无锡时,龚吉义从陆路抢先赶到祝塘,向于玲报告了这一重要信息。于玲火速部署力量,当船经祝塘时,预置在这里的祝塘常备队一举将毛耀南擒获,接着押送到东路特委书记吴仲超处,随后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,将罪大恶极的“暗杀党”魁首公开处决,有力打击了包汉生“暗杀党”的嚣张气焰。

根据“江抗”的安排,部队官兵将计就计,见机行事,机智灵活地打击“暗杀党”的恐怖



破坏活动。1941年2月,“江抗”一位女战士在北漖镇发现一个行踪诡异的女人,就主动与其接近。这个女人借机引诱女战士逃离“江抗”。女战士将计就计,将其带到附近的“江抗”行政机关,经审问,原来该女是“暗杀党”的一名眼线。“江抗”顺藤摸瓜,捕获了数名潜藏在北漖地区的暗杀党徒。此后不久,蔡炳南等3名“江抗”侦察员,在顾山镇一家茶馆发现了以大队长韦文华为首的3名暗杀党徒。为避免当场抓捕误伤群众,蔡炳南等人耐心等待时机。当发现韦文华示意两名暗杀党徒把伸手要钱的乞丐引向僻静处时,蔡炳南3人悄悄尾随,乘歹徒企图用绳子勒死乞丐之际,拔枪将两人击毙,尔后与乞丐一起返回茶馆,顺利抓获韦文华并将其押回。经公审大会宣判,韦文华被当场处决。

“忠义救国军”在派出“暗杀党”的同时,还派出一些“三青团”骨干打入东路根据地机关和抗日武装组织。1941年4月,于玲在璜马区检查工作,刚到区的那天,两个“三青团”员就鬼鬼祟祟溜走了。这引起了于玲的警觉。璜马区常备队是伪和平军一个姓高的人带过来的,背景复杂,底数不清。于玲当晚没有按时就寝,而是警惕地观察着动静。午夜时分,“忠义救国军”果然悄悄摸了过来。于玲立即把预有准备的机关和部队拉走,使敌人扑了个空。随后,东路特委采取断然措施,派璜马区委女书记徐子敏带领部队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璜马区常备队的械。经审查,常备队绝大部分队员是好的,但其中个别“三青团”员确实是坏人。于玲当即对内奸作了处理,纯洁了队伍。鉴于徐子敏已经暴露,为安全计,东路特委把她调离璜马区,安排到祝文区任区委书记。

1941年5月,于玲被送到华中党校学习。后因任苏中军区第2华中分区副司令员的丈夫乔信明两腿瘫痪,华中局委派她送乔信明去上海治病。她节衣缩食,艰苦度日,机智规避和摆脱一切危险,还受命独自一人去根据地取经费。她一面照顾双腿瘫痪的乔信明,一面积极工作和学习,先后到黄塘泥沭区委帮助工作,到苏中党校学习。在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,她提出了创办子弟学校的建议,并担任了子弟学校副校长,倾注心血培育革命后代。

29.西方文化传入

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,也即19世纪下半叶,上海展示给世人的突出印象,就是洋货充斥,洋气氤氲;就是上海“真奇妙”,时人留下的“竹枝词”中,着墨最多的就是对种种西物西事的勾勒与描绘:“西域移来不夜城,自来火较月光明。居人不信金吾禁,路上徘徊听五更。”“谁知铁树竟开花,谬语当年信不差。凿地金莲生万朵,烛天银彩照万家。”“东西遥隔语言通,此器名称德律风。沪上巨商装设广,几如面话一堂中。”电灯、电话、自来水,这类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舶来品,令人刮目相看。洋房高耸,街道宽敞,车水马龙,摩肩接踵,更体现在消费、娱乐方面,商店林立,货物山积,餐馆、茶馆、烟馆、赌馆、妓馆、戏馆、书馆和花园,七馆一园,争奇斗艳。最初点的是煤油灯,六角玻璃壳为罩或挂高处,或置铁柱之上。

1865年,中国最早的煤气公司之一在上海设立,租界马路都以煤气灯照明,俗称自来火,又因其管道从地下通出,亦称地火。当时私人用户很少,主要用于街道店铺照明。包天笑回忆说:“许多店街点自来火,讲究在煤气管子头上加一纱罩”,但当时一般人家中的照明,还是用蜡烛与油盏。直到光绪年间,洋油(煤油)进口大增,“于是,上而缙绅之家,下至蓬户瓮牖,莫不乐用洋(油)灯”。未几,上海租界已开始出现电灯,因其“大过足球,去地三文余……白光四射”,人称“赛月亮”。租界内整洁有序的市容,先进完善的设施,严格科学的管理,无不反映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,它对刺激上海人变革民居建筑和居住环境,改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,西方人过洋节的习俗也逐渐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时尚,使上海这座都市时时、处处弥散和浸润着浓郁的洋场风情。华洋杂处,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语言不通,特别是外国商人、海员、旅游者初来乍到,由于不谙华语,难免有寸步难行、一事无成之虞。于是,社会上出现一些游手好闲、又略习英语的人,充当翻译和导游的角色,从中索取报酬,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,名曰“露天通事”。“通事”者,即翻译也。当时,有一首

《上海市景词》描述此类人曰:“通事何因唤露天,能知西语少人延。沿街传达洋商意,买卖成交略取钱。”它说明在近代上海最先运用洋泾浜英语与西方人进行交际的,是那些文化层次不高,经常在街头接揽西人生意的“露天通事”。“露天通事”未经过正规训练,说的英语发音不准确,语法不规范,但在洋泾浜一带尚能通行,所以又称“洋泾浜英语”。清人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中说:“洋泾浜话者,用英文之音,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。”又说:“洋泾浜话为不中不西之一种特别话,沪上尽人所知者。”葛元煦写于光绪年间的《沪游杂记》中说:“上海中外交易,初皆不知英语,非通事不可。近则各行钱庄,盖近来设有英语文字之馆,入馆者每日讲习一时即止,月奉修金无多,颖悟幼童半载即能通晓。”

上海开埠以后,圣诞节的习俗随着西方人的大量入驻而逐渐流行起来,每到圣诞节,沪上各类西式餐厅一定热闹非凡,门庭若市。当时的一些时尚人士,到了圣诞节经常要到舞厅跳舞,或者到酒家参加圣诞晚会,还有如情人节、愚人节、感恩节等西方节日,也在上海有着较大的市场。当然,上海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,也并没有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完全丢弃,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,创造了许多既有中国本土文化内容、又有西方文化特色的文化形式,将这些西方节日改造成为中国民众所能接受和喜爱的民俗活动。

最早来上海的是西方各国的传教士,他们在科学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双重角色。传教士们远涉重洋来中国的主观愿望是要传播基督教教义,同时也负担了了解中国的地理、历史、天文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,客观上也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探索。他们不仅在中国积极参与朝廷的天文观测等科学活动,还把相关的科学资料送回西方各国的科学院,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。同时,中欧贸易逐渐加强,欧洲各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将各类中国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欧洲,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便逐渐风靡欧洲。

醉上海

仲富兰

